

# 由“治”到“防”：中国近代卫生体系的初步构建—— 以 1910-1911 年防治鼠疫为核心

李睿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省渭南市，714000；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依托不平等条约，以医疗为手段进行传教活动，间接将西方医学知识传入。随着 1910 年东北鼠疫爆发，政府初期忽略了整体管控以及卫生预防措施，以致疫情蔓延。为防控鼠疫，清政府统筹规划了以近代西方防疫之法为核心的防疫措施，有效的遏制了鼠疫的扩散，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近代卫生体系。

**关键字：**1910 年东北鼠疫；防疫；西医

**DOI：**10.69979/3029-2700.25.11.053

疫病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的传染性疾病，<sup>[1]</sup>其中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因“黑死病”的影响，西方在应对流行病时，已经形成了应对措施，《申报》曾发表《驱疫说》中就明确提出：“西人于此事极为讲求，凡其所以防之、避之、拒之于未来之前，止之于将来之际者，无法不备，无策不筹，……。而华人则专以用药疗治为先务，此则与西人之用心有相反者焉。”<sup>[2]</sup>虽然传统医学在长期与流行病的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预防意识，但始终没有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措施。应对东北鼠疫时，政府实现从消极到以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的转变，形成了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相关措施，初步构建了近代国家卫生体系，整个社会对于西方医学知识的态度也在应对流行病的具体实践中逐步从抗拒到接受。

## 1 鼠疫爆发与初期蔓延

1910 年 10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在东三省爆发。“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浹旬，蔓延奉、吉、黑三省。”<sup>[3]</sup>中国境内首例病人在满洲里地区被发现后，蔓延于东三省全境以及山东、上海等部分地区。

满洲地区，人们通常以皮毛交易为生，且获利颇多。“1910 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 1907 年猛涨了 6 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 1907 年的 70 万张增加到 250 万张。”<sup>[4]</sup>因巨大的利益驱使，中俄边境的商人及部分官员大都招募华工扑杀旱獭。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上，全绍清的报告中指出，1910 年 10 月 10 日，在满洲里客栈，寓居此处的两个木工去世，症状则是痰中带血。

而这两名木工病死之前曾经在达斡尔亚为工头张万顺干过活。<sup>[5]</sup><sup>[33]</sup>这证实俄境内早已经有鼠疫的发生，随后蔓延至中俄边境。

感染鼠疫后，有一到七天不等的潜伏期，诊断极难，一但发作，立即殒命。传统治疗手段在应对疫病时毫无办法。此时春节将近，大批劳工返乡，随之而来的就是疫情随着人员流动四处扩散，“染疫之区多有迁避他处者，疫病遂因蔓延十三。凡病人之呼吸及人与人授受之际皆能传播，此疫危险无穷。”<sup>[6]</sup>更进一步加速了鼠疫的传播速度。

东北政府，“官方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sup>[7]</sup>地方官员以及民众采取了一定的防疫措施，但大多是零散的局部防疫，效果不大。奉天地区，由东三省总督锡良指派两名医生负责。当患者出现高烧、咳血等症状时，除将病人送入由公共浴室改造而成的鼠疫医院外，毫无办法。同时由于人手不足，临时聘请未经医学训练的警察。当时根据外国人的调查来看，因疫而致死者，大多数还是中国民众。“夫今日之从事于防疫者，殆全为外人，我国官吏，则犹晏如。”<sup>[8]</sup>俄国在东清铁路上“哈至宽间备置检疫所三所，严行预防并在宽城子特设患者收容所及隔离医院。”<sup>[9]</sup>并且以其拥有的设备精良、技术雄厚的医院为依托，使得感染人数得到控制。

## 2 统筹防疫，遏制流行

政府层面急需构建强有力的防疫组织，以遏制疫情流行。1910 年底，东三省总督锡良上书清廷，请求派专

业人员前往东北协助控制疫情。清政府“以外部左丞施植之，曾任滨江道，熟悉地方情形，且与外人往来亦稔，遂派施植之为治疫大臣。”<sup>[10]</sup>同时，在施肇基的举荐下任用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 2.1 设立防疫机构

1910年12月，东三省疫情鼠疫猖獗，清政府恐奉旨令各处严防，毋令传染关内，著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随时会商，认真筹办，切实稽查，毋稍疏忽。<sup>[11]</sup>在京师设立临时防疫事务局，东北各地方政府组建防疫机构。12月14日即在奉天省城设立防疫总局，由张元奇，韩国钧负责。1911年1月26日，吉林全省防疫总局成立。1911年1月20日，黑龙江设立全省防疫总会以及各地防疫机关。防疫机构的正式设立，有助于为防疫工作提供完善的组织保障，各防疫组织制定并颁布了防疫条款，如《会议防疫章程》、《奉天临时防疫所办事规则》《临时疫病院章程》等，促使防疫措施制度化、规范化、条理化，有效推动了防疫行动的实行。因东北地区医疗设施落后，加之疫情爆发突然，医务人员十分紧缺，经由日俄医士以及各省派往东省援助的医生，缓解了医士不足的问题。此外还有商会、自治会等组建防疫会协助防治鼠疫

## 2.2 遮断交通

东北地区随着列强的入侵，构建了大规模的铁路交通网络，主要包括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以及清政府控制的京奉铁路，进而加速了这一区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此次之疫现，一为铁路沿线，二为大道沿线，三为轮船航路所达之地”<sup>[12]</sup>因此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断绝东北地区交通，运用西式检疫法，加强铁路检疫。

为防止疫情向关外蔓延，东三省总督锡良派兵驻扎在哈尔滨南部扼要，堵截人员南下。并在奉天、山海关两处设置临时医院，如遇染疫者，便于安置，到地就医。而在关内，随着疫情的不可遏制，政府方面“准备把所有的公共汽车和货车从即日起，将禁止一切对人和货物的运输，时间是15天，以免贻误鼠疫防治工作，从那以后，北京和奉天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sup>[13]</sup>在与日俄交涉后，将东清铁路、南满铁路以二、三等火车暂停开驶，南来杜绝传染，为正本清源之计。<sup>[14]</sup><sup>[2]</sup>此外，各州县要道所通地方，不论有疫无疫，都一律设卡检验。无

病者留养七日，始准他往。<sup>[14]</sup><sup>[6]</sup>黑龙江地区，因疫传至，“警务公所曾于齐昂车站设立病院及查验所，种种防范极严，故仅疫死二十四人即为消退。”<sup>[15]</sup>可见通过遮断交通可以进一步遏制因人员流动而引起的疫情传播。

## 2.3 隔离清洁

在伍连德的提议下，傅家甸分为白、红、黄、蓝四个区域，每区居民只可在所属区域内活动。城外进行军事封锁，未经防疫局许可不得随意进入傅家甸。每区由一位主要医官负责对所在区域挨家挨户检查，一但发现患者，立即送往医院，家属及其他密切接触者送至隔离营或送往借自俄国铁路局的包厢内加以隔离；所住房舍消毒，以及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sup>[16]</sup><sup>[29]</sup>同时还对警察进行防疫工作的培训，实行严格管制。

据调查，实行这一措施第一个月，因疫而死者达到3413人，最多的一日死亡了183人，但短短三十天后，3月1日，死亡人数下降为0。事实证明，通过科学的分区隔离非常有效。其他地方纷纷效仿，凡在辖区内发现有鼠疫患者，则立即隔离治疗。奉天地区，“警务局长孟秉初预筹防范之法，组织医院两处，……来往行客，逐一检察。若有沾染者即行送至医院以杜传染。”<sup>[15]</sup>进一步阻碍鼠疫传播。

东北地区正值冬季，屋内环境封闭，而时人大多没有卫生意识，鼠疫细菌极易在这环境中传播。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发现清洁是鼠疫预防措施中的重中之重。东三省总督锡良就认为防疫之法以清洁为第一要旨，政府制定的有关防疫的条款中也及其重视清洁，“第二条，住户院内各处宜扫除清洁，不可堆积，尘秽阴湿之物应时常洒以石灰酸水货石灰以除病气。”<sup>[17]</sup>此外，还有注意街区卫生、禁止使用不洁之水以及禁止贩卖变色变味之食品等防疫要事。

## 2.4 火葬

鼠疫爆发初期，因疫而死者较少，多由政府承担棺材、丧葬的开销，运送到公共墓地。但在疫情缺乏控制，死亡人数逐步上升的状况下，政府无力承担运送埋葬等事。同时哈尔滨气温严寒，冻土挖掘困难，不少尸体无法下葬。“每日染疫死者，五六十人不等。棺木日夜赶作，尚不敷用。且有将死尸抛弃江水之上害害地方者，道里居民亦复如是。”<sup>[15]</sup>

1911年1月，伍连德巡视查傅家甸地区的公共墓地，

发现“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尸体绵延至少长达1英里,暴露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任凭风雪吹打。少数棺木钉固,但多数棺盖虚掩,甚至敞开。”<sup>[16]34</sup>他认为鼠疫细菌极易通过病死者传播,构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必须实行集中火化。但是“入土为安”观念横在面前,民众对于火化一事感到惶恐不安。他邀请官员前往公共墓地,在看到同样的惨像后,他们立即达成共识,上奏朝廷,请求实行火化。在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后,1911年1月31日开始大规模焚烧尸体。“自督宪允准火葬疫死者以来,长春一郡……火葬者计不下两千五百名云”。<sup>[18]</sup>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火葬也被看做是东三省鼠疫科学防治的转折点。

### 3 鼠疫防治的历史镜鉴

从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鼠疫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被成功遏制。在疫情初期,政府所呈现的消极被动的举措以及国家层面缺乏防疫性的制度建设,疫情沿交通干线向四周蔓延,虽有零星、个别人员组织防疫,但无力遏制鼠疫的蔓延趋势。在1910年12月以后,因应疾病以及俄日等国的虎视眈眈,促使国家强制介入防控疫情,初步构建了卫生防疫体系,在京师设立临时防疫局,在地方设防疫机构,形成了整体的防疫统筹规划,紧接着颁布防疫条款,制定防疫计划,以清洁、消毒、隔离、检疫等方式防控鼠疫,以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进而展开的防疫,遏制了鼠疫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客观上构建了中国近代卫生体系。

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东北地区的医疗活动最终目的是试图打开传播福音的局面,随着疫情的发生,相当一部分医学传教士投入阻击疫情的行动中。负责整个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也是西式医学人才。李玉尚也认为,自宣统以后,国家开始采用西方防疫之法来防治鼠疫。<sup>[19]</sup>虽经专家研究,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没有一位通过细菌检验确诊的鼠疫患者曾经康复。<sup>[5]532</sup>但在采取消毒、检疫、隔离的防治方式后鼠疫逐渐得到控制中,我们可以想见,这是防控鼠疫最为有效的方式。一些报纸、小册子等传播媒介详细介绍了鼠疫的特征、预防的办法,普及了鼠疫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群众的恐慌,同时进一步向民众普及了近代卫生意识。当时社会对于西方的西学知识的态度中形成了从抗拒到接受的转变。伍连德在抗击鼠疫取得成效后强调说:“应尽一切努力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医学教育。”在应对

东北鼠疫时,也使政府认识到医学教育的紧迫性,加紧培养中国医学人才,间接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龚胜生. 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J]. 地理学报, 2003, 58(6): 870-878.
- [2] 驱疫说[N]. 申报, 1887-1-10.
- [3] 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六·锡良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3213.
- [4] 夏明方、康沛竹主编. 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8-19.
- [5]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M]. 张士尊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 [6] 北方疫患之详情, 民立报[N], 1911-1-26.
- [7] 姚崧龄. 抗疫医生—伍连德医生[J]. 传记文学, 1968, 13(06): 33.
- [8] 论说. 防疫谈[N], 盛京时报, 1910-11-18(2).
- [9] 东三省新闻. 俄员防疫南下之举[N], 盛京时报, 1911-12-1(5).
- [10] 曹汝霖.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M], 中国台湾: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66.
- [11]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218.
- [12] 杜山佳. 万国防疫会记[J]. 东方杂志. 1911年, 8(03): 21.
- [13] 东三省新闻. 关于防疫事宜之种种报告[N]. 盛京时报, 1911-1-17(5).
- [14] 马驰骋. 传统疾病与近代社会[D]. 江西师范大学, 2009.
- [15] 紧要新闻二. 满洲鼠疫记[N]. 申报, 1911-1-20.
- [16] 伍连德.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M],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 [17] 东三省新闻. 警局防疫之示谕及条例照录[N], 盛京时报, 1911-1-15(11).
- [18] 东三省新闻. 疫毙者几有不胜火葬之势[N], 盛京时报, 1911-2-17(5).
- [19] 李玉尚.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J]. 历史研究, 2002(1): 114-127.

作者简介: 李睿(1997-), 女, 汉, 陕西渭南,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